

访谈

沈秀华
江雪

沈秀华系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

江雪为中国独立记者，1998年投身媒体行业，2015年成为独立记者长期关注公民社会及人权议题

中国民主季刊

第3卷 第2期
2025年5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性别视角下的国家暴力：从台湾威权时期的受害者主体，到离散中的中国公民行动者



沈秀华



江雪

编按：如何看待性别在威权国家转型过程中的角色？在转型正义中，女性的力量体现在何处？就中国的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而言，如何看待镇压加剧的环境下，社会运动结构与议程的变化？同样，性别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为何重要？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中国独立记者江雪采访了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沈秀华。沈秀华多年致力于性别、国族主义的政治社会学研究，关切政治暴力之下的女性以及转型正义中的性别议题，是《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妇的故事》（台湾玉山社2020年增订出版）一书作者。

她也长期关注中国的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2024年5月，沈秀华在清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持了“离散中的中国公民行动——性别、世代与多元力量”系列活动，邀请全球“因政治而离散，在离散中聚结公民行动的工作者和研究者”，从性别、世代与多元公民力量的角度切入，“探讨当代中国公民力量集结可能、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逐渐噤声下，当代中国社会的纪录与研究可能”。

性别在台湾政治转型中的角色

江: 你的《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妇的故事》一书前两年在台湾重新出版，你从 90 年代就开始做口述史，记录下“二二八”受害者家属的生命经验，也提出她们作为受害者的主体性问题，指出她们自身就是国家暴力的直接受害者，而台湾转型正义工程，如果没有纳入她们的受害者主体性，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正义工程。你是怎么开始由记者采访，最后进入这项研究的？

沈: 在开始做“二二八”受难者口述史的时候，我还不是社会学者，也还没出国念书，就是一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最初我是为《噶玛兰》杂志去做专题，开始了解“二二八”。后来，算是已有两三年参与社会运动的经验，我想若要继续了解女人们的“二二八”经验，需要找谁？如果是找当时遇难者的母亲，可能年龄太大，都已离世，而他们的女儿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记忆。后来决定去采访遇难者的太太们。我后来用“政治寡妇”称呼她们。她们作为寡妇就是因为政治，因为是国家暴力造成的。1997 年我在念博士的时候，第一次在台湾出版了《查某人的二二八》这本书。

江: 你每一次访问这些受害者家属，都会问她们同一个问题：“这辈子，作为一个女人，你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你那时还很年轻，为何就有这样的意识？你关注转型正义中的妇女经验，后来走上性别学术研究道路，这件事对你个人生命的影响深刻吗？

沈: 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性别”专业是在博士以后才学习的。但我可能是一个很直觉的感受，故事听着听着，就意识到要这样问她们。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记忆，后来想，这也是促动我一直关切此事的一个因素。有一次我去做一个访谈，谈话的是一个遇难者的儿子，他父亲在“二二八”中过世。我问起他妈妈在他爸过世后过的怎么样？到现在我都还有印象，他当时的表情非常非常为难，有点不以为然的样子。后来他才说，他妈妈在他爸过世后，曾经跟另外一个男人有亲密关系。而他显然对此很不认同。其实就是他那个表情，好像突然打了我一下，也引发了我后来的这本书。我就想问，为什么“二二八”死去的都是男的？到底女人跟“二二八”有什么样的关系？

江：你在谈到她们的主体性的时候，说她们能够坚强地活下去，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抵抗空间，而且她们日后开始讲述，构成了台湾社会累积民主的基础。事实上，台湾也通过“二二八”，通过白色恐怖，构建出对政治暴力、专制政权的反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你可以再做一些阐述吗？

沈：长期以来我们对公共事务和政治事务的界定，都受男性视角影响。因为过去的所谓“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性别分工下，大部分的公共事务是男性在做。例如暴力发生，死掉的是男性，而我们忽略了暴力之后的社会，往往是靠女性支撑起来的。“二二八”受害者的家属，基本上都是想，“不管怎样，我要把孩子养大。”她们撑下来，而且最终讲出她们的故事，要一个真相。我们不能忽略掉，这种记忆本身所建立起来的东西，正是促成我们做改变的。不是说，没有她们，台湾就没有民主。而是说，她们的存在，是促成一个更深化的、长期的民主所不可或缺的。

我一开始去访谈的时候，她们还是都很害怕，不愿意录音。后来趁读书的假期再回去的时候，她们就敢录音了。这也和解严后的台湾社会慢慢放松

下来有关。

她们的这些记忆提示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曾经有很深的国家暴力，然后这些国家暴力对我们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只是我们不一定都知道。

从“二二八”以及后来白色恐怖的经验让我们看到，暴力的影响不只是一个人死了，影响更在于活下来的人，怎么继续存活的问题。我在书的绪论中也写过，“在国民党军国戒严下的台湾社会，许多台湾女人以所谓传统的母亲、妻子或女儿的身份，承担起生命不可承受之痛，一起撑出了今日台湾民主的可能……除非我们也能看到这些被设定为只是受害者家属的受害主体性，我们才能进一步了解国家暴力既深又广的残酷及永远无法被赔偿的不正义，因而我们也才会对国家使用武力（合法及非法）产生深深的警戒心，对想象台湾未来多了许多的谨慎心。”

江：这些年，对受害者家属的主体性，你不断透过演讲，再三提出她们本身就是国家暴力的受害者。近两年你又提出，她们不光是受害者，本身也是政治主体。为什么有这样的进一步阐述？

沈：1992年我第一次做访谈的时候，很多人是害怕，不敢让我录音。可还是愿意跟我讲。其实虽然她们在事发后都很担心，有人都不敢告诉孩子，但她们都有一个想法，有一天有机会，要讲出来。我们会觉得，我要去做什么抗争，我要去怎样才算是政治行动，或者才算是一种反抗行动。其实这些女性，要不是因为有她们把故事讲出来，我们就不会知道这些故事。她们承担那种苦难，还带着勇气讲出来。而讲出来的，就变成一个共同的记忆，甚至变成共同的哀悼，那为什么这不是政治行动？这当然是政治行

动啊。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就提到 mourning（哀悼），也就是“哀悼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行动”。我的这个立论就是从她这一句话得到的启发。这些女性不只是默默哀悼，她们还把那个记忆保存下来，讲出来。这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行动。然后我们通过“二二八”，同步建构出一种对暴力，对国家暴力，对专制政权的很多反思。所以这些女性本身也应该是政治的主体。这是我最新的一些思考，已经在演讲，但还没有写出来。

江：你当时做口述的时候，看到人们有很多恐惧，担心成为被清算的对象。她们是如何慢慢克服恐惧的？你在绪论中也写道，在二二八结束后，她们长期也是政治监控与被噤声的受暴主体。

沈：正如我在《查某人的二二八》绪论中所写到的：许多二二八或白色恐怖家属在个人及家庭层次，都经历国民党长期的审查与控制，这是我认为这些家属也是政治暴力直接受害者的关键论点。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在许多人被杀害或入狱下，国民党政权对台湾实施戒严，进入长期军国管控的不自由与恐惧中。国民党将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所涉及的人物及事件视为对其政权的叛乱，因而事件相关人物的家庭被贴上政治犯的标签。口述历史资料显示，国民党政府常借助警政系统，透过地方邻里长的在地行政系统协助，以户口调查为名监控并恐吓这些家庭，尤其是在政治敏感期间，甚至半夜大声敲门闯入，以户口调查为名，查看那些家庭的动静，以达到恐吓的效应。

1992年我拜访二二八受难者陈澄波的遗孀张捷女士及她的儿子陈重光夫妻家。当时已91岁高龄的张女士看到我来访，就很紧张地重复问我及她的儿媳：警察知道你来后，会不会来我们家查？陈家在一九八零年代仍经

历半夜被敲门搜屋的恐惧。

江：你讲述的这些经验，后来不断被论述，对转型正义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受害者主体性问题——没有她们的主体性就不是转型正义的工程，这样的论述有没有被听到、吸纳到台湾转型正义的政策里？

沈：应该说，这样的声音还是被听到了。这些年我受邀在许多不同场合演讲，每年都有几场与此议题相关，不仅是学校或民间团体，甚至一些政府单位也开始关注。虽然目前政策上尚未承认受害者家属本身为受害者，国家赔偿也尚未涵盖她们。但在民间与学界的论述中，已逐渐肯定“受害者家属本身就是受害主体”，以及女性声音的重要性。去年我也曾受邀到国史馆演讲，目前政府的转型正义工作已分由各部门推动，如法务部等也曾邀请我分享。若未来转型正义能真正纳入家属为国家暴力的受害者，我们对“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史料收集、人权纪念馆、纪念活动设计等，也将从聚焦被害者本身，扩展到家属的创伤经验与主体性。

江：你从“二二八”的口述历史出发，一直走到研究转型中的妇女经验，包括后来的性别研究，这些对你个人的生命影响是什么？你说过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另外你读书时就在美国办了“Taiwan Women”组织。

沈：我刚毕业就去政治与社会相关的杂志工作，那时候台湾才解严没多久，社会还没有松动，杂志社还被监听。整个氛围虽然是解严了，可整个社会，解严还不代表你完全自由，还是有一个监控系统。我去这种党外的杂志当记者，那边又是在地社会运动中心，所以接触到劳工运动、女工运动、环

保运动、教师运动等。

后来我做性别研究，也都和这段经验有关。我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就是带着这个议题去的。当时美国的功课压力很大，资料也被放置了很多年。后来好像是“二二八”50周年的时候，有出版社的编辑就催我，赶快把它弄出来。我读的专业，其实也是深受此影响，比如说我对国族主义的研究，也是因为这样我才踏入性别研究。

因为是性别专业，我又在美国办“Taiwan Women”（台湾女人），所以就有更广泛的与性别有关的东西。后来我回到台湾，跟我同一个时代的朋友都回来，他们也知道我有性别专业背景，我回来的时候，妇女新知基金会当时的董事长范云，也是妇女社会运动的人，就邀我进入新知当董事，我就这样开始，进入台湾的妇女与性别社会运动。

江：“离散中的中国公民行动”一年前在台湾举办，当时是什么样的思考与契机促成你去做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沈：当时台湾 MeToo 运动的时候，两位中国知名异议人士也出了状况，我给台湾的《妇研纵横》杂志（台大妇女研究室主办）写了一篇文章（即《台湾 #MeToo 运动与中国公民运动：性平与批判文化作为连接的核心价值》）。就是因为写那篇文章时，看到台湾的 MeToo 有一部分是跟中国的海外民间人士也有关联。这个脉络里面有一些海外中国的运动者。写的时候我记得一个很大的感想，就是过去一辈例如六四一代，相对来说非常以男性为主。在议题上面，性别也不是他们关注的。可是白纸运动非常明显，年轻一代里有不少女性。相对的，在台湾做中国研究的学术圈，以及关心中国

社会的一些团体或个人，与中国比较年轻一代的连接很有限。

所以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一方面是看到那个世代的中国行动者，运动者本身，缺少一个多元、性别的脉络。另外也觉得我们其实都站在公民社会一边，希望双方的公民社会都能够持续发展。这也算是去举办这样一个研讨会的初衷之一。

江：为什么会将关切点落在“性别、世代与多元力量”这个主题上？

沈：举办这个会议，是因为写那篇文章的过程让我发现这个缺失。就是说台湾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其实没有那么看到。这几年我有透过 X（Twitter），发现不少中国海外的社群，都是年轻一辈的。所以我知道有她们的存在。我就一直在看她们的活动。白纸运动以后，我们又看到很多女性。所以还是有性别角度。至于比较年轻的世代，现在因为习近平的原因流离在海外愿意推动公民社会的团体，许多是关心性别或女权这些议题。因为这个缘由，我就很想在台湾办一个会议，并且将主题定在多元、性别。把“性别”突出，倒不是单纯只因我个人的研究兴趣，而是因为年轻一代真的蛮多女性，也许有一些人不一定称自己是女权行动者，但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性别意识。

我办这个活动至少有两个目的，首先，我希望台湾做中国研究的学界的人能注意到：虽然现在中国国内的情况相对不好，但海外其实还是有行动者。很多人觉得，最近十年来中国的公民社会已死，但是我不这么看——或许就是换一个地方。

其实在很多国家也发生过这种事，比如说台湾在国民党戒严时期，很重要的行动者就在海外，他们后来有很多支持台湾国内的反对党，或者党外运动的民主运动。所以海外运动跟国内的运动不是没有关系的。

其次，希望大家能看到，过去的世代往往忽略掉性别的议题。而年轻世代是多元的，她们更强调议题之间的交织性。

所以希望大家看到有公民行动，即使很多人如今被迫离散到海外。我也邀请台湾的 NGO，以及关心中国社会的一些个人，因为过去长期两边的 NGO 都有互动，包括维权律师，人权团体等。

江：这样一个活动，当时感受最深的一点，或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环节？什么样的经验给你一些启发？

沈：我们有一些公开的活动，也有一些是内部的。如果说办这个活动对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要殚精竭虑地去考量安全问题。整个活动有一百出头的人参加，也挺多了，内容非常丰富，除了公开活动，也有很多私下的聊天，都很受启发。

江：你刚说交织性的话题，现在海外一些年轻人也意识到，中国的抗争者，不止是汉族人，其实有很多方面，例如藏族人、维吾尔族人等。也有一些年轻人很勇敢地意识到要跟她们做连接。前两天《不明白》播客，袁莉做了一期一个白纸运动的参与者夏巢川的访问，夏巢川就谈到她从海外的藏族、维吾尔族的抗争者学习到很多经验。你这个会议对很多行动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充电”机会。

沈：正如你所说，参与者也提到这次会议对她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很多人都散在各地，难得有机会面对面见面交流。这次会议不仅跨议题，比如劳工、环保、社区经营、性别等等，也跨世代，有人很年轻。她们有些人或者网络上见过，现在则有了实体认识的机会。

多年来，她们身处孤立的环境。许多行动即使在海外也必须隐秘进行。身处中国国内的人更不用讲，那里不仅缺乏安全保障，也常被周围的环境孤立化。在长期孤立下，许多人经历了深刻的创伤以及创伤应激。国家暴力造成的伤害，不仅针对被判刑或被杀害者，也包括那些被迫沉默、流亡或者无能为力的人。

我相信你也有创伤。很多时候也只是做一点连接，让社群还可以存活。事业没办法做，你整个生命的价值，理想，以及整个社群生活，社会生活都被否认掉，就变得很孤立。我看到的就是创伤，对应的是国家暴力力量之大。

国家暴力的力量，导致我们要办这样的活动，都有很多安全考量。但台湾来参加的一些人，都说他们对中国的朋友在这么困难状况下，而且很多都很年轻，面临安全问题、创伤问题，还持续在用各种方式在做事，这让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

另外也看到，深层创伤让行动者内部很难信任彼此。我相信你在美国也观察到这一点：她们很难相信彼此，这些其实也是因为创伤。

江：确实，国家暴力之大，使得恐惧无所不在，加上各种创伤的存在，恐惧有时候也会被放大——因为大家都很害怕，基本上“匿名化”已成为

一个非常普遍的状态。

对比台湾的经验，有没有可以帮助克服这种恐惧的可能？

另外，现在大家都很强调“社群”，分享生命经验，彼此很紧密。但同时，如果社群只限内部互动，是否也容易形成一个个封闭的小泡泡？从而与社会缺少互动，难以争取到更广大的公共支持？如果我们讨论公民社会的话，就会知道——从1990年代末到2000年后十多年间，从中国那个时候过来的人知道，公民社会其实需要很大的连接性。

沈：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因为我不处在那个位置，所以只能尊重对方的决定。因为真正负担风险的是她们。只要对方提出有安全问题上的顾虑，比如像上次举办那个活动，我就会尽量去满足她们的需求。这是我的原则：因为我不在那个位置，就没有资格替她们做判断。

江：当然，在风险方面，要做足够的考量，不要让参与者处在险境之中。但我担忧，社群其实也要汲取周围的营养，才能够慢慢变得坚强。你可以是脆弱的，但也可以在脆弱中慢慢成长。昨天我听了夏巢川在《不明白》播客接受袁莉采访，她其实回应了类似的议题。她在思考如何不止步于当前的状态。如果我们一直停滞不前，那颗小幼苗就一直是那个小幼苗。社区内部当然可以打打毛衣、看看电影，但之后呢？如何让它继续长大？当然你说的也对，因为我们不在她们的位置上，也没法给出一个判断。

另外，你提到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很多知识分子虽然身在海外，但支持国内的运动。是否可以基于台湾的经验，谈一谈海外的运动如何能影响到国

内？我想很多人心中都有疑问：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真能影响到国内吗？中国政府强大到这个程度，不仅能对异议者进行物理隔离，还有全世界最大的防火墙，信息的传播还是一个问题。在这种状况下，海外的努力究竟能在中国的转型中发挥多大的作用？

沈：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太不一样了。当年很多台湾人出国是为了念书，他们在海外也有组织，会去接触后来出去留学的人，包括像我自己，1990年代在美国读书，接触到很多海外的台美人（在美台湾人）。不同城市都有一些台湾人的组织，有些到现在还在，他们也会连接新一代。

1987年解严后，像我的世代，很多人都念社会人文科学。虽然我没有参加过“野百合”学生运动，但参与过其它运动。我们这些学生也有自己的组织，后来我们办“Taiwan Women”，谈台湾的性别议题，当时的组织都是很公开的。一个原因也是，当时台湾已经民主化。但在民主化之前，海外的台湾人也都很支持国内，比如美丽岛事件，会在海外发声，找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当时没有现在的高科技，资讯很不发达，通讯真的很难，只能通过打电话与书信，新闻报道也不像现在网络上可以看。那时台湾也有黑名单，有些人不能回台湾。

江：你刚才讲，对我也有启发，就是现在我们会觉得防火墙很高，管控很严厉。可是现在毕竟有了互联网。当年可能管控没有这么严厉，但直接物理上的限制也很大。需要打电话、电报才能联系。可能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困难。

沈：没错，所以总是会有困难，而且那时候打电话，像一些团体跟个人都

被监听。我们办公室也有被监听，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跟海外的人有接触。我也参加过一些运动的团体。去年，我有一个学生来找我，他在做一个研究，发现原来我也有被官方建档案，我一直都不知道。

江：现在的中国年轻一代，对“六四”或者海外民运一代比较排斥，觉得他们没有性别平等的意识和觉察。而在九零年代到 2000 年代的公民维权时代，那个世代的行动者，往往有松散的组织。例如 NGO 本身是以组织为基础，记者和律师虽然没有组织，但可能有松散的精神共同体。一些议题通过媒体报道，成为社会议程，甚至影响到政策。当然现在环境已变，但当时积累了很多经验的，这种经验好像也断代了。中国公民社会遭受长期打压以后的这种经验断层，这次你们会议上也有人谈到。

沈：我觉得社会本身在变，人也随之变动。我的意思是说，传承并非完全中断，像我们当年在美国读书，就接触到一些海外团体，这种连接是存在的。我们和以前的运动者，比如说野百合世代，虽然不一定有那么强的直接连接，可是我们共同感受到台湾在国民党统治下遭受的痛苦，所以这种连接性一直都在。我刚去美国，接触到的台湾学生社，他们每年也会办政治性较强的冬令营，来自全美各地的台湾留学生聚在一起。连续几天讨论台湾的政治、民主进程。这个营队也得到当时海外台美人的支持。我参加两届以后，我们一群女孩子觉得这个营队不谈性别议题，于是开始提出批评，没有直接的对立。他们不一定会来支援妇女运动、性别运动，但物质上也给我们支持。

传承问题一方面是世代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是人跟人之间的缺乏信任。有时候不单纯只是一个世代，有时候同辈之间也不一定信任。在缺乏信任

的状况下，连接与合作就更难。

江：这次会议的现场，播放和讨论了《乌鲁木齐中路》的纪录片。有人关注吗？都是谁？在台湾如今的氛围中，如此具体地研究和关注中国议题，会面临一些尴尬吗？

沈：放映现场观众很多，讨论也非常踊跃，这个场景让我深受感动。在台湾，关注和研究中国的氛围还好，因为过去双方公民社会就有一定程度的交流。尽管如今因为中国政府对台湾的军事恐吓，双方趋于敌对，但我认为在 NGO、公民社会层面，并非如此。所以我也去邀很多台湾的 NGO 来，我希望他们了解中国社会而不只是研究中国政府。

我认为，在面对中国的威胁下，台湾的公民团体更要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当然不是只认识中国政府，还应该认识中国的社会，中国社会里面很大一块就是这些公民行动者。

虽然现在整个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但我自己从事中国研究，或者举办中国研究中心的活动，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也觉得，像这样的场合，有这样的连接十分重要。虽然两边处理的议题部分有些很不一样，台湾的运动团体基本上已较为建制化，我们跟国家的关系可以直接去对接，那你们虽然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彼此中间还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连接。

江：从世代来讲，上一个世代的行动中，讲究组织分工，以 NGO 为基础，公民维权运动。而现在的年轻人以社群为抗争基础。你怎么看？年轻人以社群为基础，可能是有韧性的，即使组织不在了，那种基于生活的联结还在。

但上一代的抗争，有松散的组织，或者一个精神共同体。在媒体的环境下，会放大声音，来影响到一系列政策。今天的年轻人有什么不一样？

沈：对，是要有组织，才能去集结更多资源。你的观察是和年轻一代相对比较，但现在的情况，组织更容易有各方面的风险。但没有组织有时候也会变成很孤立。议题之间的连接，或世代之间连接可能就比较少。而且其实有组织才能去做培训。另外我相信她们可能有人也在做组织，但我们不知道。广泛来看，我觉得还是因为国家政权的暴力如此之大。每个人都要去切断所有连接。共产党就怕你有连接，不过表面上看是切断，底下不是如此不一定，可也确实反映出连接不那么容易建立。

相对于你的时代，确实不一样。但你们那个时代是中国开放后唯一的一段公民 NGO 时代，各项议题都有。只是现在的状况下，可能组织都很小，而且不是那么正式。

江：如今全球主义退潮，美国自川普上台之后，以美国优先之名，首先砍掉国际开发署，大面积停止对外援助基金，包括关闭一些关注人权的媒体。也看到不少关注中国议题的 NGO 从业者失业。另外 DEI（多元、平等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简称 DEI。是一个社会术语或原则，泛指旨在促进不同群体获得公平待遇、充分代表性及参与机会的理念及政策框架；有关概念旨在针对历史上曾经被歧视或缺乏代表性的群体）本身确实是在民主党政策期间发展起来的，如今川普上台以后大幅度消减。在这样一个退潮的趋势中，美国政府作为全球抗争资金里边最大的支持者，如今变了，很多机构也真的难以运转了。前不久《不明白》播客在荷兰的一个活动上，张洁平就谈到这个问题。这种状况下，应该如何应对？

沈：现在这种状况，性别议题，他们显然不会再做太多的支持。我觉得这影响很大，我也陆续听到一些朋友讲。台湾有少部分，但美国我知道很多。

即使资金恢复，组织早就散了。我觉得确实是要开拓其它资源。但同时也要靠自己。像台湾因为长期被排除在外——如果说中国的公民运动，从一开始就有一些国外的资金，台湾是真的没有海外资金，只能靠自己，台湾的民间团体，NGO 都是靠自己募款。这些年有国外资金进来，是因为他们去不了中国，他们关心台湾作为华人世界里面的民主社会，另外可能觉得台湾能影响中国，所以最近几年我们陆续接触到来自欧美的基金会。但是如果从台湾的经验，就是要靠自己，我们就是募款。我当妇女新知的董事或董事长，我不只要在议题上帮忙，还要去帮忙募款。即使是小额，一、两千块台币的去募款。中国有钱人很多，一般中产其实也可以捐助，尤其在现在的状况下，一定就是更要靠国内了。这是公民社会必须要去做的事。但是我觉得中国比较没有这个观念。其实我们把募款不只是当单纯募款，募款也（影响人们）来关心我们的议题。他们也是运动的一部分，是参与运动的一个方式。

江：有人认为，年轻一代特别关注性别、性权利的问题。那些相对比较旧的社会运动，劳工、维权、媒体自由等，好像不太被大家关注。当然性别议题有无可辩驳的重要性，但它不应该是大家唯一感兴趣的议题。仅仅性别议题可能也无法担当各方面变革的一个使命？

沈：我们会议来的人大部分都关心性别议题，可是他们同时也在做不同的事，也有人在劳工，媒体领域。根据我的观察，没有觉得他们不关心其他的。民主运动当然不可能只关心性别，但是我觉得民主运动没有性别平等，

是很难达到平等和民主的。

因为性别议题非常“日常生活”。我的身体，或者我的小小问题……也不断遭遇日常的互动，包括家事分工，然后运动里面的发言权，能见度，这些都是非常“性别”的。

所以性别是非常日常性的。民主也不是一个口号，我们为什么要民主？是因为我们想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一个相对平等、受尊重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要推动民主化和平等，只有性别确实是不够，可是没有性别（角度）是不可能的。对当代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很多女性，生活上感到最强烈的国家的打压就是她日常的很多性别体验，她被要求生小孩，结婚，各式各样的厌女等等。她直接感受到这个政权对她的压迫。生活的不平，就是从她作为一个女人，或作为一个性少数，或作为一个族群的少数之类开始的。我个人觉得其实只要大家都在参与运动就好。她们是从切身的感受切入，从性别切入。另外对于劳工或者其他议题，她们也并不觉得不重要。

所以与其担心大家只谈性别，不如至少用性别吸引大家进来，创造更大的空间，让她们至少做一些事情，又培养出勇气来做更多，例如白纸抗议，就是有很多具有性别意识的女孩子站出来。

参考与引用：

<https://cfcc.site.nthu.edu.tw/p/406-1203-277732,r7197.php?Lang=zh-tw>“研讨会纪要”：
夹缝求生：中国女权运动的变迁与发展

<https://cfcc.site.nthu.edu.tw/p/406-1203-279439,r7197.php?Lang=zh-tw>“研讨会纪要”：
另一种公民社会的可能？运动策略、价值与伦理

<https://cfcc.site.nthu.edu.tw/p/406-1203-278249,r7197.php?Lang=zh-tw> 纪录片《乌鲁木齐

齐中路》在台湾放映

<https://taiwantrc.org/transitional-justice/>“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网站上关于转型正义的概念

<https://gender.psc.ntu.edu.tw/119-09/> 台湾 #MeToo 运动与中国公民运动：性平与批判文化作为连结的核心价值

文中提及著作：

张文义、沈秀华：《嘎玛兰二二八：宜兰“二二八”口述史》；台北自立晚报出版社，1992

沈秀华：《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妇的故事》；台北玉山社出版，1997年。

沈秀华：《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妇的故事》绪论1；台北玉山社增订版，2020年。



黄奕信画作